

在总结讨论会上,大部分与会者认为,本届会议的主题"专业汉语的教学问题"在所作的报告中没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大多数与会者仍将专业术语看作是专业语言研究的主要课题。显然汉语专业本文及其教学法至今还未作为科研专题看待。但由于以前还没有一个学术会议将专业汉语教学列为会议主题,本届会议更显示出它的里程碑的意义。会议中某些专题的空缺以及所提出的问题指明了今后研究和努力的方向。

与会者一致认为,参加本届会议获益非浅。会议期间和休息时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与同行们共同交流经验,讨论各自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并且交换学术报告。

由于本届会议的与会者都住在 Arnold-Janssen-招待所,所以整个会议期间,尤其是会议闭幕时的总结讨论气氛热烈、坦直。会议期间与会者参观了设在圣奥古斯廷的中国研究中心,乘车游览了波恩市容。在此,与会者向会议举办者汉语教学协会以及科隆大学东亚系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对他们出色的组织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德国第十届汉语教学讨论会将于一九九八年举行,主题是"新型媒体"。

Annette Maurer
张镇环 摘译

中国的术语标准化工作

冯志伟

1. 中国的术语学研究

术语学是研究全民语言词汇中的专业术语规律的一门语言学科。早期的术语学基本上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来进行研究的。70年代以来,术语学的研究不仅与语言学密切相关,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带上了边缘性学科的色彩。术语学要研究概念的成分和结构、概念的特征、概念的定义方法、概念的交叉关系、概念体系等问题,因此,术语学与逻辑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术语学要研究概念和概念体系的分类方式和技巧,因此,术语学又与分类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术语学要研究术语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它又与本体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术语学要研究情报文献处理中的各种术语问题,并以之作为情报检索的基础,因此,术语学又与情报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术语学还要研究各科的术语问题,因此,它又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样,术语学就逐渐从传统的应用语言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一门几乎涉及人类知识的各个部门的独特的博大精深的学科,它的理论和方法也逐渐完善起来。不但语言学家关心术语学,而且,几乎所有学科的专家都有必要来关心术语学问题。在应用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还没有哪一门学科能够像术语学这样引起如此众多的其它学科专家的注目和关切。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术语学在人类现代知识总体结构中的重要位置。

审定和统一科学技术术语,实现科学技术术语的规范化,对于我国社会的繁荣和富强,特别是对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代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海洋工程、宇航工程、核科学技术、能源技术、超导材料等前沿科学和高技术,在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与激烈竞争的时代里,对于具有独特语言文字体系的中国来说,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就有着更为特殊的重要性。例如,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中,如果没有统一的和规范化的术语,计算机技术在对语言文字进行信息处理时就将会困难重重。近年来,在生产、对外贸易和其它经济活动中,由于术语的内涵不一、理解不同而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事例也时有发生。因此,现代术语学的研究和发展水平,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的术语数据库,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术语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自然语言中的结晶,人类科学探索的成果都要以术语的形式在自然语言中记录下来,虽然术语学已经从传统应用语言学中独立出来,但是,术语的研究与语言学其它部分的研究仍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语言学家在术语学的研究中将是大有可为的。中国的术语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研究汉语的术语问题,因此,中国的术语学研究又与汉语的词汇、语法乃至语义的研究密切相关。当代社会的发展对汉语术语的研究提出了迫切

的要求,作为中国的语言学家有必要来关心这方面的问题,绝不能对此掉以轻心,更不能对此熟视无睹。在我们总结现代汉语规范化四十年丰硕成果的时候,很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术语工作所走过的历程。

2. 中国古代的科技术语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曾占据光辉的地位。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指出的:"从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知识水平……,许多发明、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科学的光辉篇章。"

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科技术语。荀子的《正名篇》是一本关于语言理论的著作,其中许多论点都与术语问题有关。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的命题,肯定了“名”为“实”所规定,“实”异则“名”异,“实”同则“名”同;他认为“名”的作用是“别同异”,并说,“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这些思想对术语学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汉初的《尔雅》一书中,收集了各科的术语,全书分为19篇,科学技术术语占了大半数。除前3篇《释诂》、《释言》、《释训》为解释一般词语之外,《释亲》、《释器》等16篇均解释名物词,共1400多条,许多词条都下了定义,可以看成是一部古代术语词典。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葛洪(278-341)的《抱朴子·仙药篇》、南北朝祖冲之(429-500)的《缀术》、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等著作中,都创造了许多科学术语。汉、唐时期的佛典翻译,吸收了很多梵文的佛教术语。玄奘(600-664)提出了八个字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求真”就是忠实于原文,“喻俗”就是通俗易懂。为了解决音译与意译的问题,他又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秘密故”、“含多义故”、“无此故”、“顺古故”、“生善故”等五种情况。梵文译为中文时均采用音译。北宋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中创造了许多数学、物理学、地学术语。明代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创造了许多农业、土壤和水利工程方面的术语。宋应星(1587-1662)的《天工开物》,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十九世纪就被西方学者译成法文,相继又被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该书也收集了大量的科技术语。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使用了数百种植物和矿物岩石名称,其中,仅矿物岩石就分为水部、土部、金部三大类,采用了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相结合的分类方法和命名方法。明末清初的科学技术翻译事业也很兴盛,中外学者合力译撰了不少关于天文学、数学、物理学、采矿冶金、生理学、生物学、地图学、化学方面的著作,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例如,《西洋新法历书》、《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全义》、《三角算法》、《比例对数表》、《泰西水法》、《奇器图说》、《远镜说》、《坤輿格致》、《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坤輿万国全图》等。十九世纪下半叶,以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为中心,译撰了大量的科学技术著作。例如,李善兰等人合译撰的《化学阐原》、《天学发轫》、《算学课艺》、《几何原本》(后九卷)、《代

数学》、《代微积拾级》、《谈天》、《重学》、《植物》、《奈端物理》等,徐寿译述的《西艺知新》、《化学鉴原》、《化学考质》、《化学求数》、《汽机发轫》等,华蘅芳与傅兰雅共译的《金石识别》、《地学浅释》、《海防新论》、《代数学》、《微积渊原》、《三角数理》、《合数术》等。在这些译作中,都创造了许多新的术语。例如,在徐寿译《化学鉴原》之前,中国只有一些最普通的化学元素术语,如金、银、铜、铁、锡等,《化学鉴原》一书,开始按照西文第一音节创造中文的化学元素术语,并且这成为了化学命名的基本原则,如钠、钾、锌、钙、镁等。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严复(1853-1921)在翻译西方新术语时,一方面选用意译词,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不少音译词,他提出了“信、达、雅”三条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实践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这个时期,胡以鲁在《论译名》一文中,虽然力主意译,但也提出了不妨音译的十类词。这些都表明,术语的制定与规范化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到了清末,要求统一译名的呼声越来越高。1909年,学部派严复编定各科中外名词对照表及各种词典,并成立了以严复为总纂的科学名词编定馆,这是我国第一个审定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机构。

3. 辛亥革命以来的术语标准化工作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科学技术知识的进一步传播,术语的审定工作显得更加重要。江苏教育会的理化教授研究会首先审定了物理学和化学术语,中华医学会组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1915年相继审定了化学、物理学、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的术语。1918年中国科学社起草了科学名词审定草案,191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23年出版了《矿物岩石及地质名词辑要》,截至1931年共审定各学科术语14部,均为草案。

1928年在大学院内成立了译名统一委员会,1932年成立了国立编译馆,专门负责管理全国科学技术术语审定工作。国立编译馆聘请审定委员多人,在当时的教育部的主持下,召开过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的术语讨论会,1933年制定并出版了化学命名原则,1934年出版了物理学名词草案和天文学名词草案,1935年出版了数学名词,1936年审定了矿物学名词草案,1939年完成了气象学名词草案;在生物科学方面,1949年以前已经完成的名词草案有如下几个学科分支:比较解剖学、昆虫学、细胞学、组织学、普通动物分类学、脊髓动物分类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生理学、植物学、植物生态学、普通园艺学、植物园艺学等。天文学名词从1934年出版后,于1937年进行了增订,1940年已增至7000条,又经1942年、1948年两次审定,为天文学术语的统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1949年底,国立编译馆编成的名词术语草案还有岩石学、人文地理学、电机学、机械学等共五六十种。

此外,我国在1908-1915年间,完成了《辞源》的编写工作,共四册;1936年还完成了以字代词的百科词汇《辞海》的编撰工作,共三卷。这两部词典中收了大量的科学技术术语,并对这些术语下了定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术语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50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接管了国立编译馆拟订的各科术语草案。1950年4月6日,成立

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下设自然科学组、社会科学组、医药卫生组、时事文学组、艺术组共五个组，中国科学院负责自然科学组，其工作范围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地球物理学、工程、农学等学科。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由有关自然科学学会及研究机构分别提名，经中国科学院遴选，由文化教育委员会审核后聘任。当时聘任的科学家有150人，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1956年，文化教育委员会撤销，学术名词的规范化工作归口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在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下设置了名词室，负责统一和审定全国自然科学术语的工作。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改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定室。文化革命期间，术语的审定工作完全中断。1978年，由中国科学院主持，筹建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接着就相继成立了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数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气象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等，召开了一系列的术语审定会和讨论会。1985年4月25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主任为钱三强，委员约70人。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涉及广义的自然科学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等。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

为了适应我国科学技术事业飞速发展的需要，促进自然科学术语早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于1985年4月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经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商定，该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牵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负责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审定与统一的权威机构，凡经该委员会审定公布的自然科学术语，全国的教学、科研、生产以及新闻出版等部门，都应该遵守使用。

委员会由我国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任主任委员，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叶笃正教授等六人任副主任委员。

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

- 1、研究、制定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审定与统一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具体措施。
- 2、拟订全国自然科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的长远规划与近期计划。
- 3、广泛宣传自然科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推动自然科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的开展。
- 4、组织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术语、命名原则以及科学符号，并予以公布。
- 5、组织开展自然科学术语学的学术研究工作，负责搜集有关中外术语资料和信息，研究和制定自然科学术语的原则和方法，以便使我国的自然科学术语的命名，建立在现代术语学理论的基础之上。
- 6、负责与国际术语机构建立联系，以利于国际自然科学术语的定名协调一致。

7、通过各种渠道，同港、澳、台湾有关单位和个人建立联系，并进行自然科学术语方面的学术交流。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室。办公室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研究室经办自然科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并开展术语学的研究工作，其业务活动在主任委员、常务副主任委员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委员会按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以及交叉科学等专业领域，分别成立专门的名词审查分委员会，负责制定本学科术语审定与统一的近期计划和长远规划，并开展各种审定活动。各分委员会可根据本学科的具体情况，按分支学科划分为若干审定小组，分别负责审定。

为了推动自然科学术语审定与统一工作的开展，委员会创办了《自然科学术语研究》的学术刊物。为了及时地报道术语工作的动态，交流各学科术语审定工作的情况，委员会还不定期地印发《简报》。

委员会成立之后，在自然科学各学科都进行了术语的审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在物理学术语的审定方面，1949年，在全国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中设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小组，从1950年9月开始，经一年的紧张工作，公布了物理学术语9696条，出版了《物理学名词》一书，为物理学术语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许多术语的定名，经过了反复的推敲，最后才择善而从。

60年代初，物理学名词委员会又组织了《物理学名词补编》的编订、审查工作，共审定物理学术语6000多条，于1970年出版。接着又组织物理学术语的增订工作，增订的物理学术语与原来已出版的《物理学名词》、《物理学名词补编》合编成《英汉物理学词汇》，于1975年出版，此书是中国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三十多年工作的结晶，先后印刷了3次，印数达十二万册之多。1978年中国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恢复工作，又先后审定了新增补的物理学术语约1000条，在《物理》杂志上发表。1982年又决定对《英汉物理学词汇》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增订。

我国前辈物理学家对于物理学术语工作非常重视，亲自参与了许多物理术语的定名。例如，charm quark 这个术语，原译为“魅夸克”，英文中charm有“魔力”、“娇媚迷人”、“美好”等三个含义，而“魅”字只有前两个含义，无“美好”的含义，王竹溪教授建议定名为“粲夸克”，取《诗经·唐风·绸缪》中“今昔何昔，见此粲者”诗句中“粲”字“美物”之义，不但语义确切，而且“粲”字的汉字读音与英文的charm也很近似。diffraction 这一术语，原译为“绕射”，杨肇廉教授建议定名为“衍射”，因为“绕射”只描述了波遇障碍物发生转弯的现象，而“衍射”则反映出惠更斯波派生繁衍之状，更准确地表达了物理过程的本质。laser 这个术语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首字母缩写，曾有人译为“激光辐射放大、光受激辐射放大、受激光辐射放大、光量子放大、受激发射光”等，或者译为“莱塞”，前后有过十几种译名，钱学森教授建议定名为“激光”，很快就统一了这一术语的定名。fluidics 这个术语是指利用射流的附壁、分流、切换等效应来实现自动控制的一种新技术，原译为“射流”，不够准确，钱学森教授建议译为“流控技术”，这就更确切地

反映了这一术语的含义。可见,把物理学术语译为汉语,这是我国许多前辈物理学家集体创作的结晶,这是他们对中国科学的一大贡献,他们的创造性工作,对于现代汉语新术语的规范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化学术语的审定方面,我国于1955年公布了《无机化合物系统命名原则》,1960年公布了《有机化学物质系统命名原则》。随着化学学科的发展,这两个《原则》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中国化学学会专门成立了“无机化学名词小组”和“有机化学名词小组”,约请有关专家,对两个《原则》中的每个章节进行审查,并参考了国际纯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的《无机化学命名法》和《有机化学命名法》,提出增订和修订意见,而后印成《草案》分送国内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多次召开全国性的座谈会,对《草案》进行了讨论,并于1980年,公布了新的《无机化学命名原则》和《有机化学命名原则》,1984年出版了《英汉化学化工词汇》。这些工作有效地推动了现代汉语化学术语的规范化。

在天文学术语的审定方面,50年代初期,以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的名义颁布了英汉对照的《天文学名词》1700条,1958-1959年间,又相继出版了俄英中、英俄中、中俄英三种不同对照方式的《天文学名词》,所收术语达5000条。1974-1976年间,由南京大学天文系主持编纂了《英汉天文学词汇》及其增订部分,所收术语达6000条。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天文学会一恢复工作就组建了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积极开展新术语的收集整理、古天文学术语的研究、国际天文学术语的研究交流等工作,并准备《俄英中天文学名词》的编纂,在《天文学进展》上展开天文学术语的讨论,同时协助南京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出版社名词室审查了《英汉天文学词汇》第二版共16000个术语条目。

1984年上半年,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英汉天文学名词》第二版的基础上着手编制新的《天文学名词》,同年七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和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共同召开了天文学名词审定会议,拟订了术语选择规范、编辑条例、审定条例,并编出了2000个词条的天文学名词分类词表和专用词表,会后作为征求意见稿印发全国有关专家和单位广泛征求意见。

1985年六月,召开了第二次审定会议,研究和审议征求意见稿回收的反馈意见,修订《天文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会上决定,对于一些新术语或概念易于混淆的有争议的术语以及具有中国特点的术语,应作简明的注释,在按分支学科和天体层次分类词表内,术语应按概念的相关性排列。例如,岁差、总岁差、日月岁差、行星岁差、测地岁差、赤经岁差、黄经岁差等概念内涵相近的术语应编排在一起,星族、星族I、星族II、星族III、盘族、臂族、晕族等术语也应编排在一起。

1986年四月举行了第三次审定会。审定会完成了《天文学名词》的定稿,其中第一部分是天文学中常见的的基本术语,第二部分是天体专名和天象专名的十一个表,共收术语1956条,其中有100条术语加了注释。会后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用计算机编印成册,作为送审稿上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86年六月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钱三强的名义,将送审稿分送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的天文学科的全国委员和

指定的专家进行复审。1987年四月举行了第四次审定委员会会议,对送审稿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完成了《天文学名词》的前言、编排说明、名词正文和注释、天体和天象词表的全部定稿工作,并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用计算机编辑了汉语拼音索引和英文索引。1987年9月27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公布了《天文学名词》,公告指出:“自公布之日起,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这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以来第一次正式公布的自然科学术语,标志着我国自然科学术语的审定与协调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天文学术语的审定工作中,力求把术语的字面含义和它的学术含义统一起来。例如,“多层球”这个术语,英文为polytrope,其字面含义和学术含义中既没有“层”,也没有“球”,而其学术含义指的是用多方过程为物态方程构成的星体模型,现修订为“多方模型”。

在术语的命名中,特别注意术语的系统性,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原则。例如,在宇宙学术语中,“学”、“论”、“模型”等字用得十分混乱,“大爆炸宇宙模型”这一术语,有人叫做“大爆炸宇宙论”,有人叫做“大爆炸宇宙学”。在术语审定中,提出了一个层次结构,凡属学科分野的叫做“学”,如“宇宙学、宇宙观测学”,凡属学派之见的叫做“论”,如“相对论宇宙论”,凡属具体方案的叫做“模型”,如“大爆炸宇宙模型”,这样,就系统地表达了这些术语的学术含义。

在数学术语的审定方面,1956年和1964年由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数学名词》和《数学名词补编》,1974年又出版了《英汉数学词汇》,使得数学术语的混乱现象有所减少。

为了全面地对数学术语进行审定和协调,成立了数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87年11月,召开了数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数学术语的编排工作框架,对于数学的基本术语的选择原则作了初步的规定。例如,一个概念对应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术语时,一般应选定其中之一,如“公理,公设”,“无穷,无限”,“有序,全序”,“半序,偏序”等。对于目前影响较大但还不统一的术语,不宜强行统一,可保持现状或在公布时适当说明。例如,“矢量,向量”,“算子,算符”等。对于与其它学科共用的术语,如其它学科已经统一,可参照其它学科的统一定名。例如,“既约”和“不可约”,物理学中已统一为“不可约”,数学中亦可统一为“不可约”。数学术语的审定工作目前正在积极进行之中。

在医学术语的审定方面,50年代初期,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该组曾根据审定的草案,编定各科医学术语十余种,由人民卫生出版社陆续印行。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医学名词汇编》,此书为我国现代医学术语的统一与审定工作打下了基础。

但是,我国医学术语的使用还是比较混乱的。我国国土辽阔,医学术语常常存在地域分歧。例如,“肝硬化”这个术语,北方常称“肝硬变”,南方常称“肝硬化”。此外,由于医学内部专业较多,分工越来越细,各个专业内形成了一套习惯用语。例如,将甲型病毒性肝炎称为“甲肝”,将甲状腺功能亢进称为“甲亢”,彼此难于理解,妨碍了各专业之间的交流。

对于一些新出现的术语,由于缺乏统一的审定与协调,常出现不同的中文译名。例如,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这个术语,最初按英文缩写 AIDS 译为“爱滋病”,后来,因为这种病不仅出现于同性恋者之间,有的儿童应用血制品后也会得此病,又改译为“艾滋病”,这样,同一种病便有了两个中文译名。

为了进一步统一医学术语,1984年中华医学会第十九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医学名词委员会,建立了医学名词办公室,并相应地成立了各学科的名词审定小组,其中,呼吸科、耳鼻咽喉科、妇产科、泌尿科、消化科、内分泌科、心血管科、神经外科、传染科、血液病科、风湿病科、内科、老年医学科、微生物与免疫学、肾病学等学科的术语审定组已审定了术语六千余条。

至于我国传统的中医学,早已形成了相当完整的术语体系,但是,如何将这一套术语体系翻译成外文,以利国际交流,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在地质学术语的审定方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后,1987年5月组成了地质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分地质学综合术语、地史学和地层学术语、构造地质学术语、矿物学术语、岩石学术语、地球化学术语、矿床学术语、环境地质学术语等方面,组成审定小组进行审定工作。1987年1月组成了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下设7个审定小组分专业进行地理学术语的起草和审定工作。

我国的标准化部门也十分重视术语工作。

所谓标准化,就是在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完成其功能的过程中,用人为的方法,消除其所不必要的个别属性,使这些事物符合某种标准,从而保证它们能够相互交换而不受生产的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的一种全社会的活动。

在标准化工作中应该遵循简化性、协力性、实践性、选择性、复审性、方法性、强制性等原则。

早期的标准化工作只限于产品的标准化,如铁路的轨距、螺纹的类型、螺钉的尺寸等等。后来人们才认识到,标准化的对象不仅包括产品,而且还应该包括这些产品的语言表现--术语。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而且是同等重要的,因而术语标准化就成了标准化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有的学者明确地提出,术语的标准化应该先于产品的标准化。

为了推动我国的术语标准化工作,国家技术监督局建立了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SBTS/TC 62),下设三个分委员会:第一分委员会负责术语学的理论和应用,第二分委员会负责辞书编纂,第三分委员会负责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全国术语标准化委员会已经完成如下的国家标准:

- 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 标准化工作导则 术语标准编写规定
- 辞书编纂符号
- 建立术语数据库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 术语与辞书条目的记录交换用磁带格式

- 术语数据库开发规范
- 术语数据库开发文件编制指南
- 术语学词汇
- 辞书编纂术语
- 术语数据库技术评价指南

我国有关专业部门也逐渐建立了相应的专业术语标准。例如,在机械方面,已经制订了金属切削机床术语、建筑机械术语、起重机械术语、矿山机械术语、渔业机械基本术语、空气分离设备术语的标准,在船舶方面,已经制订了船舶通用术语、船舶设备术语、船舶工艺术语的标准,并完成了“船舶工业术语标准体系”,在铁路方面,已经制订了铁路机车术语、铁路车辆术语的标准。此外,还制订了色漆和清漆术语、拖拉机术语、感官分析术语、地质仪器术语、无损检测术语、环境保护术语、邮政业务术语、汉语信息处理术语的标准。

为了促进术语的协调统一和发展,加强国际、国内术语工作的交流与合作,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1993年成立了中国术语工作网。中国术语工作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网员,促进术语网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术语信息资料,并进行咨询服务,组织有关教学和培训活动,组织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的研究与开发,组织有关书刊的编辑与出版,承担国际术语网的对口业务。中国术语工作网的成立,对于动员更多的单位和专家开展术语和术语标准化工作,加强国内外术语工作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术语的统一,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国还开展了术语数据库的研制工作。这项研究是首先从语言学界开始的。1985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派了一位计算语言学专家前往联邦德国夫琅禾费研究院开展术语数据库的合作研究,这项合作研究涉及到汉语的处理,建立了一个英汉对照的术语数据库,研究成果被欧洲共同体所使用,这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使用汉语的术语数据库,我国学者回国之后,便在国内积极倡导术语数据库的研究。在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专门的课题组,先后建立了应用语言学术语数据库和计算语言学术语数据库,开我国术语数据库研究的先河。接着,机械部机械科技信息研究院于1989年开始建立机电工程术语数据库,计划收50万条术语,第一期工程拟收25万条术语,分为20几个门类,100多个专业,英法德日俄汉多语言对照。目前,该课题的小型试验库已在微机上建成。此外,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了农业叙词表中术语的数据库,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拟建立标准化术语数据库,并与奥地利合作进行开发。我国的术语数据库建设出现了初步繁荣的景象。

术语是语言的一部分,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术语进行研究,应该是应用语言学责无旁贷的任务。我国学者在术语数据库的工作实践中,提出了“潜在歧义论”(Potential Ambiguity Theory,简称PA论),指出了中文术语的歧义格式中的包含着歧义性的一面,也包含着非歧义性的一面,因而这样的歧义

格式是潜在的,它只是具有歧义的可能性,而并非现实的歧义。这一理论已在国际会议上发表,它是对传统语言学中“类别-实例 (type-token)”观念的冲击。我国学者还提出了“术语形成的经济律”,证明了在一个术语系统中,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与术语平均长度的乘积恰恰等于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之值,并提出“FEL公式”来描述这个定律。最近,我国计算语言学研究提出在术语的研究中,应该提倡“结构功能观”,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来研究术语,并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我国学者还积极参与了术语工作国际标准和制定,在许多国际标准中,都吸取了我国术语学者的意见。

总的说来,我国术语学的研究比较注重应用,在理论上注意不够。提高语言学理论和计算机科学的素养,仍然是我国术语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Summar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developing procedure of terminology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erminology in China since 1949. The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Natural Scientific Terms was set up in 1978. This Committee published the standardized terms of 30 scientific subjects including astronomy, physics, biochemistry, medicine etc. The National Technical Committee for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was set up in 1985. Under this Committee there are three Sub-Committees: the Sub-Committee for Termin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he Sub-Committee for Lexicography and the Sub-Committee for Computer-Aided Terminology Work. A series of national standards (GB) on terminology has been published. China's terminologists developed some terminological theories: the "Potential Ambiguity Theory (PA-Theory)", the "Economic Law in Term Formation (FEL Formula)", the "Structure-Functionalism" etc. A new terminology school – the "China School" – is forming.

Tianzhu, Shangdi oder Shen? Zur Entstehung der christlichen chinesischen Terminologie

Jost Zetzsche

Bei der Entwicklung der christlichen chinesischen Terminologie lassen sich verschiedene Verfahrensweisen aufzeigen.

1. Entlehnung von Termini aus dem Wortschatz anderer Religionen oder Denkrichtungen;
2. Transkription von Termini;
3. Neuschöpfung von Termini.

Dieser Aufsatz wird darzustellen suchen, daß die Wahl der Verfahrensweise von der historischen und ideologischen Situation der jeweiligen Autoren und Glaubensgemeinschaft geprägt war.

1. Nestorianische Termini

Die Geschichte des Christentums begann mit dem Eindringen der Nestorianer nach China. Die heute bekannten schriftlichen Zeugnisse stammen aus der Zeit zwischen 635 und der Mitte des 9. Jahrhunderts. In der vermutlich ersten Schrift, *Xuting mishisuo jing* 序聽迷詩所經 – wahrscheinlich: "Sutra des Messias Jesu"¹ –, zeugen alleine die zahlreichen Fehlschreibungen von der Ignoranz der nestorianischen Missionare in bezug auf das Chinesische. Verstärkt wird dieser Eindruck durch eine offenkundige Abhängigkeit von buddhistischen Assistenten bei der Übersetzung oder Niederschreibung. "Gott(heit)" wird unter anderem mit *fo* 佛 = "Buddha" übersetzt, oder es werden so spezielle buddhistische Begriffe wie *yanluo wang* 閻羅王 = "Yama (der [buddh.] König der Unterwelt)" bzw. *aluohan* 阿羅漢 = "Arhan (oder Arhat)" eingesetzt. Darüber hinaus zeigen die Transkriptionen von einer Assistenz, die sich einen Spaß aus der Verballhornung von Namen machte, die für die christliche Lehre von zentraler Bedeutung sind. So wird aus "Jesus" *yishu* 移鼠 = "Ratten versetzen" – und aus "Messias" *mishihe* 彌尸訶, wo die zweite Silbe die Bedeutung "Leiche" trägt.

In späteren Dokumenten, so zum Beispiel auf der berühmten Stele aus Xi'an von 781, *Daqin jingjiao liuxing Zhongguo bei*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 "Stele zur Verbreitung des Nestorianismus in China" setzt sich die Tendenz zur Übernahme fremdreligiöser Termini fort. Der chinesische Teil des Untertitels lautet: *Daqinsi seng Jing Jing shu* 大秦寺僧景淨述 = "überliefert vom Mönch Jing Jing aus dem Daqin-Tempel". *Si* 寺 und *seng* 僧 sind Termini aus

¹ Vgl. Haneda (1928:450-451). *Jing* ist bei den nestorianischen Titeln mit "Sutra" übersetzt, da es, gemessen an der sonstigen Wortwahl, eher dem buddhistischen Vokabular entnommen sein dürfte als dem konfuzianischen ("Klassiker").